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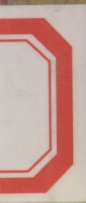
唐代宫廷史

下

杜文玉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 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23

唐代宫廷史

杜文玉 / 著



K242.06

D868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第四章 安史之乱后的宫廷

第一节 肃宗、代宗时期

一、肃宗即位初期的举措

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时，由于朔方镇的精兵早已调出参加平叛战争，只留少数老弱守边。身边的朝臣人数也很少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这些人中并无特别突出的人才可以用来辅佐大政。肃宗身边最亲近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宠姬张良娣，另一个则是宦官李辅国，都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嬖人。但是肃宗的即位对于当时混乱的政治局势来说，总算使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，对人心的振奋、士气的鼓舞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正因为如此，衣冠士庶归于灵武者道路相继，其中有两个人对肃宗来说最为重要，即李泌与郭子仪，这一文一武成为唐肃宗的得力助手。

李泌，字长源，他是西魏八柱国之一李弼的六世孙，祖籍辽东襄平（今辽宁辽阳老城），却世代居住在长安。此人智慧早成，在唐玄宗时期，为张说、张九龄等人所器重，称为奇童。天宝时，玄宗命他为待诏翰林，供奉于东宫，成为太子李亨的师友。后来因为做诗讽刺杨国忠、安禄山，被杨国忠中伤，贬到蕲春郡安置。李泌是这一时期一个比较奇特的人物，他历肃宗、代宗、德宗三朝，屡遭奸佞妒忌陷害，却总能利用智术躲过祸患，并对朝廷政事提出补救和贡献。李泌避祸的方法不外乎两条：一是不求做官，以皇帝的宾友身份自居，于是便进退自如了。二是大讲神仙之术，《新唐书·李泌传》说：“及长，博学，善治《易》，常游嵩、华、终南间，慕神仙不死术。”正因为如此，



唐肃宗像

所以李泌常以世外之人自居，淡泊名利，不与人争，一旦形势对己不利，他便会飘然离去，从而躲开是非中心。可以说李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古代智士和忠臣。

郭子仪，华州郑县人。武则天统治时期以武举高等入仕，任左卫长史。唐玄宗统治时期历任诸军使、左卫大将军、九原太守、朔方节度右兵马使等职。天宝十四载(755)，安禄山反叛后，升任为灵武郡太守、朔方节度使，奉命率大军在河北一带与叛军作战，屡败叛军，立有战功。肃宗即位后命其班师，遂率五万大军返回灵武，壮大了灵武唐军的声势，并积极对长安采取进取之态势。

肃宗在局面初步稳定后，遂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李泌至灵武后，肃宗大喜过望，“出则联辔，寝则对榻，如为太子时，事无大小皆咨之，言无不从，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。上欲以泌为右相，泌固辞，曰：‘陛下待以宾友，则贵于宰相矣，何必屈其志！’上乃止”



郭子仪像

(《资治通鉴》卷218)。于是肃宗特创了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这一名号以安置李泌,也就是使他以这一名号处理军国之务。同时,又用宦官李辅国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,地位仅次于李泌,也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。肃宗听从李泌的建议,以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,诸将皆隶属于元帅府,以便统一指挥对叛军的军事行动。

李泌在仔细分析了天下形势后,向肃宗指出:安禄山反叛,支持者多为番将,汉人只是高尚等少数人,其余均是胁从,估计不出两年当彻底剿灭叛军。他规划的用兵方略大体上是:令李光弼率军出井陘,郭子仪出河东,威胁叛军后方,使安禄山的大将史思明、张忠志等不敢离范阳、常山等处,安守忠、田乾真不敢离长安,这样就使安禄山在洛阳的大将只剩下阿史那承庆。郭子仪进入河东后,不要截断长安至洛阳之间的道路,官军进驻扶风,与李、郭诸军相互配合,分次出击,使敌军往来援救于千里之间,疲于奔命。而官军保持以逸待劳的



李光弼像

优势,随时出击,但不与叛军打硬仗,只要达到疲惫敌军的目的即可。等到至德二载(757)春,命肃宗之子建宁王李倓率兵进攻范阳的北面,李光弼攻范阳南面,两面夹击,攻取范阳,使叛军无路可退。然后集中兵力,诸路并进,围攻长安、洛阳,可以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平定叛乱。客观地看,李泌的这个策略是正确的,但是却很难得到实施,原因就在于它并不符合肃宗的想法。因为肃宗抢班夺权成功后,为了争取人心的拥戴,必须尽快做出能够振奋人心的举动,而收复两京尤其是收复长安在他看来便是首先必须要做的大事,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,在政治上取得主动。而李泌的建议虽好,却不能立竿见影,自然不被他看好。因此,平定安史之乱战争之所以持续了八年之久,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在一条错误的路线指导下进行的。

在朝廷政治方面肃宗也做了一些改进,比如李林甫任宰相时规

定谏官言事必须先要报告宰相,上奏皇帝后还要向宰相报告都说了什么话;御史台的御史们奏事时必须要有御史大夫的署名,不允许单独进奏。李林甫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控制言路,巩固自己的权位,此时都予以改正,开放言路,以鼓励朝臣们大胆谏诤。李林甫、杨国忠曾长期在政事堂执政事笔,即为秉笔宰相,排斥了其他宰相以独掌大权。肃宗为了避免宰相专权局面的再度出现,规定宰相分别在政事堂当值,执政事笔,每十日更换一次,从制度上以杜绝此类现象的产生。

重用第五琦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,专掌五道财政。此前第五琦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、江淮租庸使,而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的任命,标志着肃宗把江淮地区的财政大权全部交给了第五琦,命他全面负责唐朝平定叛乱所需财赋的筹措之责。第五琦变革盐法,实行食盐专权,在天下产盐之处设置监院,派官专管,命原来的旧盐户和自愿从业的游民为亭户,免除其徭役,专门生产食盐;所产之盐全部由官府收购,禁止私煮、私贩,违者严惩。普通百姓除了交纳租、庸之外,不得再有任何摊派。旧史称赞说:“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。”可见第五琦的改革是成功的,既解决了平叛战争所需的巨额财赋,又没有加重百姓的负担,激化社会矛盾,要说有危害,也只是侵夺了盐商等少数人的利益。

唐肃宗本非励精图治之主,虽然在即位初期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,但由于重用李辅国,宠信张良娣,使得朝廷及宫廷内部的矛盾逐渐激化。尤其是他拒绝采纳李泌制定的正确平叛方略,急于攻取长安,虽然在花费了巨大的人力、财力后收复了两京,但叛军的实力并没有完全被歼灭,其退到河北后又再度反扑,从而延长了平定叛乱的时间,不仅使广大人民长期陷于战火的煎熬之中,而且也极大地削弱了大唐帝国的实力,使这个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大帝国从此走上了衰落的道路。

二、李辅国专权

(一)李辅国其人

李辅国，原名李静忠，“身小貌陋”，自幼便被阉为小宦官，在高力士手下当差。高力士任飞龙大使时，他在飞龙厩为掌管养马的小给使，直到四十余岁时，由于颇知书记，遂令其掌管飞龙厩簿籍。天宝年间，王锜任闲厩使，因为其掌管的账目清楚，故非常赏识李辅国，遂命其掌管马料。由于他“能检撻耗欺，马以故肥”（《新唐书·李辅国传》），王锜非常满意，便推荐其入东宫，成为太子李亨的心腹宦官。太子李亨在灵武即皇帝位后，遂任命其为太子家令、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，并赐名李护国。“四方奏事，御前符印军号，一以委之。辅国不茹荤血，常为僧行，视事之隙，手持念珠，人皆信以为善。”（《旧唐书·李辅国传》）唐肃宗驻蹕凤翔，准备攻取长安时，授其为太子詹事，改名李辅国。

肃宗回到长安后，对李辅国更加信任，命其专掌禁兵，居住在宫中，权力进一步膨胀，史载：“制敕必经辅国押署，然后施行，宰相百司非时奏事，皆因辅国关白、承旨。常于银台门决天下事，事无大小，辅国口为制敕，写付外施行，事毕闻奏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221）李辅国不仅专断朝政，而且还实行特务政治，置察事数十人，分散于民间，暗中探听和监视百姓的一举一动，一旦发现不轨之事，马上知会司法部门逮捕推按。李辅国还对司法部门横加干预，甚至有御史台、大理寺重囚审理未毕，李辅国下令送交银台门，一时纵放。三司（指御史台、大理寺、刑部）、京兆府、长安与万年两县推按刑狱，皆先禀告李辅国，轻重随意，皆以制敕的名义发号施令，无敢违抗者。李辅国排行第五，宦官们不敢直呼其官号，皆谓之“五郎”。宰相李揆，为山东大族，见李辅国执子弟礼，谓之“五父”。

其实李揆并非是谄媚无耻之徒。其拜相之初，长安城中多盗贼，甚至有在大街杀人而置尸于沟中者。当时李辅国掌典禁兵，遂奏请从羽林军中选骑兵五百人负责京城巡检。李揆闻知此事，上奏说：

“昔西汉以南北军相统摄，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，遂安刘氏。皇朝置南北衙，文武区分，以相伺察。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，忽有非常之变，将何以制之？”（《旧唐书·李揆传》）李揆以汉代的南、北军与唐代的羽林军、金吾卫类比未必得当，但李辅国以自己掌控的禁军取代金吾卫的职能却包藏着祸心，李揆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，指出了李辅国此举的危害，从而挫败了李辅国的图谋，至于他称其为五父，乃是不得已的保护身家性命委蛇之举，虽称不上丈夫所为，却也无非议。

李辅国羽毛既已丰满，遂不满足于已有的官爵。早在收复长安之初，大封功臣，李辅国封郾国公，唐代宗时晋封博陆郡王，开了唐代宦官封王之先河。李辅国还身兼十数职，所谓“肃宗还京，拜殿中监，闲廐、五坊、宫苑、营田、栽接、总监等使，又兼陇右群牧、京畿铸钱、长春宫等使，勾当少府、殿中二监都使”（《旧唐书·李辅国传》）。其散官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是文散官中第一等，从一品。至德二载（757），拜兵部尚书，余官如故。其到尚书省当值时，诏命群臣皆送，赐御府酒馔及太常乐，武士戎装夹道，荣耀已极。李辅国还不满足，公然要求拜相，遭到了肃宗及宰相的抵制，没有得逞。唐代宗即位后，因其有拥戴之功，尊为尚父，“政无巨细，皆委参决”，不久，加司空，拜中书令，又开了唐代宦官拜相之先河。

有唐一代，专权擅政的宦官甚多，但是名位如李辅国之崇，又封王又拜相者，却是仅见于此。

（二）祸乱国事

李辅国既专断大政，遂招降纳叛，结党营私，排斥异己，祸乱国事。如宰相崔圆，随玄宗入蜀时拜相，直到肃宗移驻扶风时才来谒见，朝臣们皆认为其必会罢相。崔圆遂厚结李辅国，赠以重金，于是便受到肃宗的宠信，巩固了权位。除了崔圆，另外两个宰相苗晋卿、裴冕也畏惧李辅国的权势而依附于他。李辅国欲求拜相，指使裴冕向皇帝推荐，却遭到另一名宰相萧华的阻拦。李辅国大怒，遂借肃宗患病之机，假借皇帝的名义，罢去萧华的相位，贬为礼部尚书，后来又

指使元载将其贬为硤州员外司马，卒于贬所。代宗时，裴冕为右仆射兼御史大夫，充肃宗山陵使，为了讨好李辅国，遂上表推荐李辅国的私党术士刘烜充山陵使判官。刘烜因事犯罪，裴冕受其牵连被贬为施州刺史，仅仅数月，因李辅国之故，便又重新被召回京师，任左仆射。

在李辅国当权时期，无论文武如不投靠他便会遭到排斥，如太常少卿李勉刚正无私，肃宗将要重用，因为不愿意投靠李辅国，不但不得重用，反而被赶出京城，外任州刺史。乾元三年（760），韦伦被任命为山南东道襄邓等十州节度使。当时节帅拜免皆出于李辅国之意，韦伦既为朝廷公用，又不愿私谒李辅国，虽有朝廷的正式任命，却不能赴任，很快便改任为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、本州防御使。陕州刺史魏少游拒敌安史叛军有功，升任京兆尹，李辅国因为他不愿依附于己，遂改任卫尉卿。京兆尹为京师地区的行政长官，权任颇重，而卫尉卿虽为九卿之一，在此时却是闲散之职。

徐浩在肃宗即位后，自襄州刺史召授中书舍人，“四方诏令，多出浩手，遣辞贍速，而书法至精，帝喜之。又参太上皇诰册，宠绝一时”（《新唐书·徐浩传》）。因为请求恢复唐初旧制，触及了李辅国的利益，为其所恨，不久便贬为庐州长史。

诗人高适正直无私，任谏议大夫时敢于对当时的弊政进行谏正批评，引起了权贵的极大不满。永王李璘之乱爆发后，肃宗召见他征询对付方略，高适极言永王不足惧，不久即败。肃宗大喜，任命他为淮南节度使，会合诸道兵进讨。未及进兵，而永王败亡。尽管如此，高适的见识才干已使李辅国极度不安，多次在皇帝面前诋毁高适，将其贬为太子少詹事。

李麟随玄宗入蜀，被玄宗任命为宰相，其他宰相如韦见素、房琯、崔涣、崔圆等皆在肃宗身边，只有李麟留在蜀地辅佐玄宗。玄宗回到长安后，李麟继续担任宰相，并封褒国公。当时其他宰相如苗晋卿、崔圆等，畏惧李辅国的权势，纷纷依附以保平安，独李麟不肯向其低头。李辅国对李麟又气又恨，遂设法罢去其相位，改任太子少傅。

在肃、代统治时期,就连李泌这样的重要人物也难逃李辅国的陷害,被迫辞职以避祸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:肃宗即位之初,玄宗见张良娣得宠,遂赐其七宝鞍。李泌对此举却不以为然,遂对肃宗说:“今四海分崩,当以俭约示人,良娣不宜乘此。请撤其珠玉付库吏,以俟有战功者赏之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18)此话被张良娣听到,遂说:“我与先生乃乡里之旧,何至于此!”肃宗劝解道:“先生乃是出于社稷之虑。”遂命将此鞍收入库中。此事引起了张良娣对李泌的极大不满。后来张良娣封为淑妃,接着又册为皇后,随着地位的不断攀升,对李泌的言行便更加不满。而李辅国见李泌甚得皇帝的宠信,甚为忌妒,遂与另一宰相崔圆联合起来,日夜对李泌进行毁谤。在宫内宫外的联合攻击下,李泌自知无法再在朝中立足,遂主动向肃宗请辞。肃宗不得已,下诏给李泌三品官的俸禄,并为其兴建房舍,使其隐居于衡山之中。

李泌的离去对正与叛军苦战的唐朝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李辅国不仅对朝中文臣不附己者大肆排挤,对那些立有军功的武将同样也不放过,如郭子仪、仆固怀恩等著名大将,莫不遭受过诬陷。郭子仪心胸开阔,虽然屡遭猜忌,甚至被罢去兵权,但都能做到坦然自若,并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。而仆固怀恩就不同了,作为番将,脾气暴躁,受不得一点委屈,他的叛唐原因虽然比较复杂,然李辅国的诬陷不能不说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。他在给代宗的上书中明确写道:“是时数以微功,已为李辅国谗间,几至毁家。”(《新唐书·仆固怀恩传》)可见李辅国在这件事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。

仆固怀恩一家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了极大的功劳,一门之中为国而死者达四十六人之多,他的女儿为使回纥能够支援唐朝,远嫁和亲。其叛唐之后,三年之内多次导引吐蕃、回纥大军进攻关中,威胁长安,给唐朝造成了极大的压力,为了抵御其侵扰,唐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。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,李辅国是要负一定历史责任的。

李辅国祸国的另一件事就是重用奸臣元载。在安禄山叛军最为猖獗之时，元载任职于江左一带，两京收复后，肃宗调其入京任户部侍郎、度支使并诸道转运使。元载见李辅国势大，遂投靠其门下，正好李辅国之妻元氏与元载为同宗，元载遂利用这种关系与李辅国打得火热。京兆尹缺任，李辅国遂推荐元载为京兆尹。元载推辞不就，李辅国知其心意，遂又推荐其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度支转运使如故，即一举拜相。唐代宗即位后，李辅国权势更盛，多次在代宗面前称赞元载之才，于是又升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加集贤殿大学士，撰修国史。后来，元载专权擅政，排挤正人，祸乱国事，使得唐朝的政治更加黑暗腐朽，这一切的根源全在于李辅国对其的引荐。

李辅国排挤正人、颠倒是非的事例，可以说比比皆是。如术士申泰芝以左道而深得李辅国的信任，遂提拔其为谏议大夫。唐朝在道州设置军一级屯防单位，派军队驻守，他遂令申泰芝为军校。申泰芝招诱当地少数民族，收其金帛，赏以官职，又放任士兵剽掠当地百姓。地方官吏不敢治其罪。潭州刺史庞承鼎对此早就愤愤不平，遂乘申泰芝到潭州办事时将其逮捕，搜得赃物达百万之巨。在获得确凿证据后，遣使人京上奏皇帝。李辅国为了庇护申泰芝，上奏皇帝，请求召其回京当面责问。申泰芝因为李辅国的支持，无所忌惮，面见皇帝时反倒告庞承鼎诬陷。肃宗遂下诏追究庞承鼎诬枉之罪，命监察御史严郢负责审理此案。严郢经审理认为庞承鼎进奏属实，而申泰芝确有贪赃事实。肃宗大怒，反而将严郢流放建州（今福建建瓯），然庞承鼎也因此得以昭雪。

三、宫廷内部的斗争

（一）建宁王李倓之死

唐肃宗共生十四子，除了长子李豫（即李俶）外，依次是越王李系、建宁王李倓、卫王李泌、彭王李仪、兖王李侗、泾王李侔、郢王李荣、襄王李僎、杞王李倓、召王李偲、兴王李侗、定王李侗以及第十四

子李僖。

李倓为肃宗第三子，其母是宫人张氏。据史书记载：李倓“英毅有才略，善骑射”（《新唐书·承天皇帝倓传》），在肃宗诸子中是最为英武果敢的一个。在肃宗与玄宗马嵬分道扬镳时，李倓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力劝肃宗不要跟随玄宗到西蜀去。当肃宗与玄宗分手后，在讨论去向时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独李倓力排众议，主张前往灵武。他说：“殿下（指肃宗）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，将吏岁时致启，倓略识其姓名。今河西、陇右之众皆败降贼，父兄子弟多在贼中，或生异图。朔方道近，士马全盛，裴冕衣冠名族，必无贰心（时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）。贼入长安方虏掠，未暇徇地，乘此速往就之，徐图大举，此上策也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218）在前往灵武的途中，李倓自选骁勇之士亲自统领，与强寇散兵屡次血战，一直护送肃宗到达灵武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决定选哪一位皇子为兵马元帅时，肃宗首先考虑到的人选就是建宁王李倓，只是由于李泌的反对才没有任命，而是改为其兄广平王李俶。

那么李泌为什么要反对任命李倓为元帅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《资治通鉴》卷218有详细的记载，录之如下：

上欲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，使统诸将东征，李泌曰：“建宁诚元帅才；然广平，兄也。若建宁功成，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！”上曰：“广平，冢嗣也，何必以元帅为重！”泌曰：“广平未正位东宫。今天下艰难，众心所属，在于元帅。若建宁大功既成，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，同立功者其肯已乎！太宗、上皇，即其事也。”上乃以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，诸将皆以属焉。倓闻之，谢泌曰：“此固倓之心也！”

可见李泌考虑事情比较长远，他主要是从将来册立谁为太子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认为在太子尚未正式册立前，只能维护广平王长子的地位，使其能够顺利地被册立为太子，以避免再次发生宫廷内争。同时，从上面的记载也可以看出，李倓是一个心胸坦荡的人，丝毫没有夺取太子地位的野心。

李倓虽然没有夺取太子地位的野心,可是他的死却与争夺太子地位直接相关,因为只有在这个问题上对他进行中伤才最有杀伤力。那么,又是谁对李倓进行中伤,极力置其于死地呢?自然离不开张皇后与李辅国二人。关于李倓得罪于此二人的事,还得从肃宗刚刚抵达灵武不久说起。

前面已经提到玄宗赐张氏七宝鞍之事,当时劝阻的人除了李泌外,还有一个人也牵连进来了,这个人就是建宁王李倓。事情经过是这样的:肃宗听从了李泌的建议,将七宝鞍收入库中。忽听廊下有一人抽泣不止,于是便传唤入殿,原来是建宁王李倓。肃宗问其为何而泣?李倓回答说:“臣比忧祸乱未已,今陛下从谏如流,不日当见陛下迎上皇还长安,是以喜极而悲耳。”由此张氏深恨李泌与李倓。胡三省指出:“为良娣潜杀倓,泌不自安张本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18胡三省注)《新唐书·后妃列传》却说:“倓助泌请,故后怨。”说明李倓也曾正面支持过李泌的看法。不仅如此,李倓还多次在肃宗面前诉说张氏及李辅国之罪恶,引起了两人对他更大的愤恨。

李倓又是一个敢说敢做的人,他见张氏与李辅国专横擅权并且对李泌极为不满,于是便对李泌说:“先生举倓于上,得展臣子之效,无以报德,请为先生除害。”言下之意是要除去张、李二人。李泌劝阻说:“此非人子所言,愿王姑置之,勿以为先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19)李倓不听,遂招致了杀身之祸。

张氏与李辅国联合起来,多次在肃宗面前诬告建宁王说:“倓恨不得为元帅,谋害广平王。”肃宗一时性急,没有详查,便下诏将李倓赐死(《资治通鉴》卷219)。李倓之死在宫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,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广平王李俶和李泌,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,李俶打算铲除张氏与李辅国,他向李泌征求意见,李泌劝阻说:“不可,王不见建宁之祸乎?”并且表示自己不久将归隐山林。李俶说:“先生去,则俶愈危矣。”于是李泌告诫他说:“王但尽人子之孝。良娣妇人,王委曲顺之,亦何能为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19)可见如果不是李泌从中斡旋,宫廷内部将会因此事再掀起一场风波,并将极大地

影响唐朝平定安史叛军的事业。

从此后的情况看,李俶还是按李泌所说的做了。《旧唐书·后妃列传》载:“太子弟建宁王倓为后诬讐而死。自是太子忧惧,常恐后之构祸,乃以恭逊取容。”李俶的这种态度便是李泌所教。

后来,肃宗也认识到自己错杀了建宁王,当然这种认识是在李泌的开导下取得的。据载,至德二载(757)九月,官军攻下长安,他们在一次召见中谈到了建宁王之死的话题。肃宗坚持认为:“建宁,朕之爱子,性英果,艰难时有功,朕岂不知之!但因此为小人所教,欲害其兄,图继嗣,朕以社稷大计,不得已而除之,卿不细知其故邪?”李泌对曰:“此皆出谗人之口,岂有建宁之孝友聪明,肯为此乎!且陛下昔欲用建宁为元帅,臣请用广平。建宁若有此心,当深憾于臣;而以臣为忠,益相亲善,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。”经过李泌的分析解释后,肃宗也认识到错杀了李倓,哭泣着说:“先生言是也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20)后来在唐德宗时,李泌与德宗也谈到这一话题,德宗也说:“建宁叔实冤,肃宗性急,讐之者深耳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33)建宁王李倓是唐德宗的叔父,故云建宁叔。

正因为建宁王之死乃是李唐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,是一宗冤案,所以后来唐代宗李豫(俶)即位,于大历三年(768)正月追赠李倓为齐王,同年五月又追尊为承天皇帝。当时李泌请求追赠太子之号,而代宗认为建宁王首倡灵武之议,成中兴之业,竭诚忠孝,为谗人所害,只有追尊帝号才可称其夙愿。可见代宗与建宁兄弟感情之深。

(二) 李豫是怎样当上太子的

李豫原名李俶,是唐肃宗的长子,初封广平郡王。因为李豫是唐玄宗的嫡皇孙,所以他的出生令玄宗非常高兴。据载,李豫生下三日,玄宗亲自前往看望,保姆见其身体瘦弱,怕皇帝看了不高兴,遂另取宫中其他孩子抱来顶替。玄宗看后不乐,保姆急忙叩头认错,玄宗说:“非尔所知,趣取儿来!”当他看到嫡孙后,心中大喜,对着太阳看了又看,说:“福过其父。”于是下令大摆宴席,尽欢而归(《新唐书·后妃列传》)。

唐肃宗即位后，遂任命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，统领诸军先后收复了长安、洛阳。肃宗回到长安后，晋封其为楚王。在李豫任天下兵马元帅时，郭子仪、李光弼为副元帅，具体指挥作战均靠这二人，李豫本人并没有多少战功，但他毕竟是最高统帅，因此两京的收复自然也就成了他的政治资本，对其最终被立为太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乾元元年(758)三月，改封李豫为成王。由于肃宗即位以来忙于军事，故一直没有将册立太子之事排上日程。当两京收复后，便将此事提上了议事日程。当时张良娣已经被册立为皇后，有子数岁，也想将其子立为太子，遂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化了。张皇后共生了两个儿子，即兴王李绍、定王李侗，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张氏到底想立哪个儿子为太子。由于兴王李绍此时已死，故张皇后只能是为定王李侗争取太子之位。李豫之母吴氏，生前并没有册立为太子妃，亦未被册为皇后，其章敬皇后的名号还是后来追赠的，而张皇后之子却是嫡子，册立为太子亦无不可。

以上所论是和平时册立太子的问题，当时正处在战争状态，因此就不可以常理论之。李豫既为长子，又在收复两京中立有大功，故朝野上下大都倾向于立其为太子。而且李豫在任天下兵马元帅期间的作为，也使人心倾向于他。唐朝为了尽快收复京师，曾向回纥借兵，约定攻克城池后，土地、士庶归唐，金帛、子女归回纥。攻下长安时，回纥如约打算纵兵抢掠。李豫不顾皇子、元帅之尊，拜于回纥叶护马前，请求说：“今始得西京，若遽俘掠，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，不可复取矣，愿至东京乃如约。”于是回纥从城南绕过，扎营于浐水之东，没有入城。百姓们对李豫此举感激涕泣，曰：“广平王真华夷之主！”就连肃宗听到此消息后也说：“朕不及也！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220）收复东都洛阳时，回纥遂入城抢掠府库，然后又大掠坊市三日，李豫制止不听，于是便献出锦罽宝贝，当地父老又拿出缯锦万匹给回纥，这才使其不再继续掳掠。李豫的这些作为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戴。

还有一事也为李豫增色不少。唐军攻下洛阳后，投降叛军并接

受伪职的以陈希烈为首的原唐朝官员三百余人素服请罪。李豫以肃宗的名义将他们全部释放，送归长安。此举对分化叛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，很多投降的原唐朝官员和将领纷纷打算归顺朝廷。后来肃宗处死了陈希烈等降官，使得打算归顺的人闻而止步，肃宗又后悔不已。从这些事件上，人们也看到了李豫的睿智与深谋远虑，因而人心更加倾向于他。

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外，李泌、李揆等人也力主立李豫为太子。李泌在唐军攻取长安后，在肃宗召见时对肃宗说：

“昔天后有四子，长曰太子弘，天后方图称制，恶其聪明，鸩杀之，立次子雍王贤。贤内忧惧，作《黄台瓜辞》，冀以感悟天后。天后不听，贤卒死于黔中。其辞曰：‘种瓜黄台下，瓜熟子离离：一摘使瓜好，再摘使瓜稀，三摘犹为可，四摘抱蔓归！’今陛下已一摘矣，慎无再摘！”

肃宗愕然曰：“安有是哉！卿录是辞，朕当书绅。”李泌对曰：“陛下但识之于心，何必形于外也！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220）

在此之前，肃宗第三子建宁王李倓已被张皇后、李辅国陷害而死。“是时广平王有大功，良娣忌之，潜构流言，故泌言及之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220）李泌此言不仅保护了李豫免遭毒手，而且也隐含着劝肃宗立李豫为太子之意。

李揆时任中书舍人，深得肃宗赏识，称其门第、人物、文章为三绝。当时张皇后势力正盛，宗室中有人请求给其加“翊圣”之号。肃宗召问李揆，回答说：“臣观往古后妃，终则有谥。生加尊号，未之前闻。景龙失政，韦氏专恣，加号翊圣，今若加皇后之号，与韦氏同。陛下明圣，动遵典礼，岂可踪景龙故事哉！”肃宗大惊曰：“凡才几误我家事。”遂不再提起此事。李豫改封成王后，张皇后加快了夺嫡的步伐。肃宗为了册立太子之事征求李揆的意见，李揆力主立成王为太子，并说：“陛下言及于此，社稷之福，天下幸甚，臣不胜大庆。”肃宗的本意也不想废长立幼，得到李揆的支持后高兴地说：“朕计决矣。”（《旧唐书·李揆传》）遂在乾元元年（758）十月，册